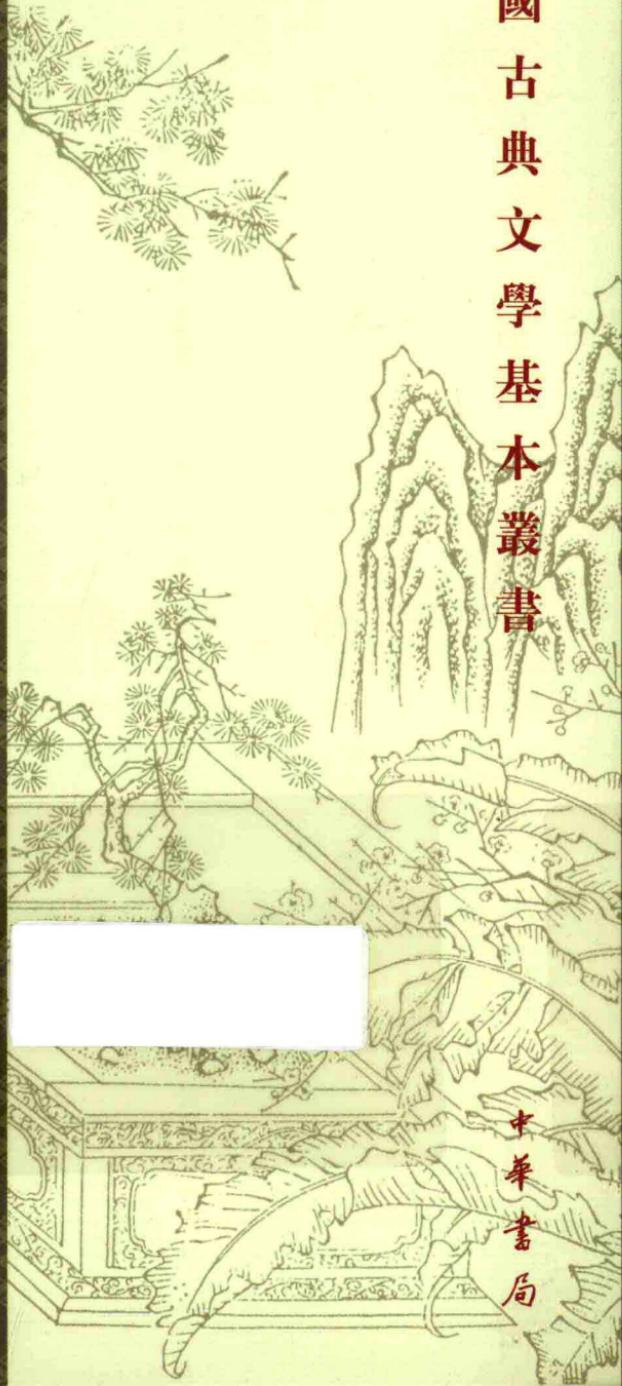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中華書局

袁桷集校注

第一册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袁桷集校注

第一冊

元  
楊  
吉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袁桷集校注/(元)袁桷著;楊亮校注. —北京:中華書局,2012.10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ISBN 978 - 7 - 101 - 08641 - 6

I. 袁… II. ①袁… ②楊… III. 中國文學:古典文學－作品綜合集－元代 IV. I214.7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2)第 066811 號

責任編輯:張 耘

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

**袁桷集校注**

[元]袁 梷 著

楊 亮 校注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市白帆印務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 86% 印張 · 16 插頁 · 2200 千字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 - 3000 冊 定價:266.00 元

---

ISBN 978 - 7 - 101 - 08641 - 6

# 前　　言

## 一、袁桷的生平仕履

袁桷字伯長，一字養直，號清容居士、見一居士。慶元四明鄞縣（今浙江寧波）人。早年受業於王應麟、舒岳祥、戴表元，思想上主張朱陸合流，並提倡實學；文學上繼其師戴表元，力糾宋末文風之頹廢，影響更大；於史學上主持修有《延祐四明志》。

### （一）

袁桷的生卒年，《元史》卷一七二《袁桷傳》云：「泰定四年卒，年六十一。」<sup>[一]</sup>後世之記述多襲《元史》，如吳榮光《歷代名人年譜》<sup>[二]</sup>，顧易生、蔣凡、劉明今《宋金元文學批評史》<sup>[三]</sup>，均定其生年為一二六七年，實為錯誤。元王元恭《至正四明續志》之《人物》條言：「袁桷，字伯長，同知樞密詔之曾孫。生於錢唐官舍，七日而母病渴卒。鞠於外祖妣張氏。」<sup>[四]</sup>儘管對其生年未有涉及，但卻給我們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生於錢唐官舍，七日而母病渴卒」。

檢《清容居士集》，袁桷對此多有記述，如《西山阡表》：「桷生七日，而母史夫人卒。」<sup>[五]</sup>又如其

詩《病中玩易復次韻》：「丙寅老人五十九，猶是先天第二圖。」<sup>(六)</sup>再如《外祖母張氏墓記》：「咸淳二年丙寅夏六月，會稽夫人實生桷，甫七日，洞下遽卒。」<sup>(七)</sup>均言其生於丙寅年。丙寅年爲南宋度宗咸淳二年，即一二六六年。與文中記載剛好相合。更爲詳盡而且可靠的記載見於袁桷爲其生母撰寫的行述中，《先夫人行述》曰：

桷始生之七日，已不孝罹禍。於先夫人音容永隔，無所容罪。每侍先大夫，嘗語曰：「汝生之年，歲大熱，丙寅爲火，協於支干。臨安居民繁湫，坐地沃水，猶喘息不得止。茵席器案，如執焦。汝母體素弱，一夕暴泄，輒不可藥。目光已離，猶視汝在褓中，復愀然曰：『桷來前。』念至是，曷可忘耶？」

言其母平素身體孱弱，丙寅年又天氣大熱，酷暑不止，其母難產，故于袁桷生下七日後即逝去，和前文所述完全吻合。

比袁桷略晚的著名文人蘇天爵所寫《袁文清公墓誌銘》言：「泰定初，辭歸。四年八月三日，以疾終於家，享年六十有一。」<sup>(八)</sup>而蘇天爵又曾被袁桷大力提攜，得以任職翰苑。兩人較爲熟悉，其記載當最爲準確。則袁桷生於一二六六年夏無疑矣。

袁桷的家族——四明鄞縣袁氏，爲南宋詩禮傳承之大族，如袁燮爲陸學主要傳人，其子袁甫爲南宋狀元，後爲名臣。袁桷一支，曾祖袁韶幼學於族父袁燮。家貧而勤學不止，中淳熙十四年進士。自此之後其家族一躍而成四明名門。韶曾任臨安知府，同知樞密院事、資政殿學士、淮西安撫制置使等

官職。李全叛揚州，袁詔主張用兵，被權相史彌遠罷歸。後提舉洞霄宮，嘉熙元年五月卒，贈太傅，後贈太師、越國公。《宋史》卷一四五、《延祐四明志》卷五、《鄞志稿》列傳三皆有傳。鄞縣史、鄭、楊、袁皆爲當時巨族，爲維護家族利益，往往相互聯姻，如袁桷母親史棣卿，字景華，出自南宋名相史浩之後；袁桷妻鄭氏，出自宋丞相鄭清之之後；袁桷之女所嫁亦皆爲故宋皇族趙氏之後，故其家族人物鼎盛。

## (二)

袁桷號清容居士，其作品集亦名《清容居士集》。而遍閱其作品，未見其何故自號清容居士，其同時人亦少稱清容者，後世多不曉其名號之由來。

檢《萬曆湖州府志》之《古跡》條有清容軒之記載：「慈感寺內。元袁桷，字伯長，號清容居士，讀書於此，因名，嘉靖中毀。隆慶初，知府黃樞重建。(楊復詩)清容軒子水邊開，排闢青山翥鳳來。若水有香清永晝，花欄無地著浮埃。風吹蓼渚黃蓉老，月浦藤牀貝葉堆。借問遠公蓮社裏，於今若個有詩才。」<sup>〔九〕</sup>《湖州府志》還引明王世貞《復清容軒記》：「吳興水至多，割地幾十之五，其城西南隅爲勝。西南隅枕水而宮者至多，慈感寺爲勝。慈感寺之景至多，清容軒爲最勝。……袁學士袁先生桷，號清容者，微時客吳興，讀書其中，因取其號軒之。趙文敏公孟頫爲題字，而文敏亦時往來流憩若舍館，以故其名稱益著。」<sup>〔十〕</sup>《浙江通志》卷四二《古跡四·清容軒》：「袁桷自號清容居士，與子昂同讀書，構清容軒，今在慈感寺內。」<sup>〔十一〕</sup>

從以上方志之記載可推知袁桷早年並未在家鄉四明，而是客居湖州，而吳興為湖州之別名。其讀書之處命名為清容軒，地點並未在鄞縣。並且其讀書之處後來變成著名佛教寺廟。即是先取其名號為「清容」，而後由趙孟頫題額命為「清容軒」。

隨時間推移，清容軒之得名漸為人所遺忘。清人所修《鄞志稿》中未提及清容一事，僅提及「築鷗波館」。《鄞志稿》之《袁桷傳》：「趙文敏孟頫極相推重，為築鷗波館於吳淞江上，延居之。」〔二〕袁、趙二人於鷗波館讀書，未見別書記載，後人頗有疑之者。鷗波館為趙孟頫讀書休憩之處，《文物天地》第一五一期介紹《鷗波亭圖》為絹本設色，為趙孟頫與其夫人管道昇二人合作唯一傳世之作，可推知鷗波亭並非杜撰。又檢《元詩選·癸集上》收有龔開《題趙鷗波高士圖》：

雪氣侵人臥欲僵，苦勞明府到藜牀。  
主賓問答皆情話，何用閑名人薦章。

同卷尚有錢仲鼎《題鷗波高士圖二首》：

在昔洛陽，雪深丈餘。士也高卧，來令尹車。今年吳淞，雪復何如？積素一色，鷗鷺有無。  
之子江臯，修亭是居。

有琴有書，有酒有魚。賞靜獨眺，聊以自娛。挹茲清風，凜凜起予。此景此圖，再卷再舒。

由時人之題詩，可見當時與趙在湖州往來之文人。雖袁桷作品中未見其早年與趙孟頫讀書鷗波亭之記載，但從龔開與錢仲鼎之詩中可以推知《鄞縣志》之記載應該大致可信。

南宋滅亡後，袁桷家族也受到影響。吳興讀書，一定是在元貞元年（時桷三十歲）以前。因袁桷

有《龍興路司獄潘君墓誌銘》「元貞元年，桷掌呂成公麗澤祠」的自述<sup>(三)</sup>。光緒《鄞縣志》人物傳六亦記曰：「年二十餘，部使者舉茂才異等，元貞元年為麗澤書院山長。」<sup>(三)</sup>則袁桷二十多歲時被薦出仕，是可以確證的。

其師戴表元作有《清容齋記》，對袁桷何故名「清容」有如下解釋：

鄭袁生養直既規寢旁為讀書之齋，而榜之曰「清容」，曰：「吾慕東郭順子之為人而云耳。」其所從遊之賢者，台劉君正仲父為友，復於伯夷、柳下惠、清和之說……今夫袁生生於萬石之家，而躬寒素之操，處未弱冠之年而志丈夫之事。日取古聖賢之言味之，學其道，求其清焉已。乃有所不慊於語，而容人是圖，是何生之所聞於道者過耶？道未有清而不能容，亦未有不能容而得清者也。<sup>(四)</sup>

戴表元在袁桷早年對其影響甚大，師生之情甚篤，故戴之說較為可信。從戴之記述來看，袁桷幼年時家族已漸趨寒微，不復袁韶時盛況，又經宋末之喪亂，對其家族不可能沒有影響，故其早年之生活與上述之《萬曆湖州府志》、《鄞志稿》、《光緒鄞縣志》可以相印證，與趙孟頫在湖州之往來亦屬可信。

其「清」之說是慕東郭順子、伯夷、叔齊之為人，又受其友劉正仲之影響，而「容」取其包容萬物，胸懷廣大之意。所以其號實包含志向、立身、待人接物之原則，適逢宋末社會動蕩、士人飄零輾轉之際，如此名號，自是有其深意。

袁桷是元代儒學代表人物之一，但其儒學思想少有人言及，實有必要重新檢視。桷曾應安熙弟子蘇天爵之請，於至治三年（一三二三），爲這位北方儒學代表人物作《真定安敬仲墓表》。清人萬斯同《儒林宗派》言安熙是北方劉氏學派的代表人物，起自劉因，傳至烏叔備，再傳至安熙，安熙傳至楊俊民、蘇天爵。袁桷對安熙評價頗高，將其與南宋大儒真德秀作比。《墓表》云：

真文忠公德秀與朱文公同里，生不及事焉，文公之學，真實紹之，侑食與廟，於祠無異辭。集賢劉公生愈後，闡揚合一，劉公與真公並。安君不得見劉公而道寔有傳。盛矣哉！

目前所見流傳諸書，均將袁桷列爲朱子學派的代表人物，如《宋元學案》深寧學案有《文清袁清容先生桷》。其傳記內容與《元史》本傳相同，唯其卒年將《元史》誤記之處進行更正，改爲年六十二。清人萬斯同《儒林宗派》中亦將袁桷列入朱子學派：

朱子學派（朱熹）→體仁（元善，無咎，浦城）→真德秀（希元，西山，浦城，文忠）→王埜（子文，潛齋，金華介子）→王應麟（伯厚，深寧，鄞縣）→戴表元、袁桷、王昌世（昭甫，應麟子）

袁桷家族於儒學傳統上推崇陸學，並非朱子學派。《宋元學案》呂陸門人條有《正獻袁絜齋先生變》：「乾道初，入太學，時陸復齋九齡爲學錄，先生望其德容肅然，亟親炙之。同里沈叔晦、楊敬仲、舒元質皆聚於學，朝夕相切磨。」《光緒鄞縣志》有《袁燮傳》：

乾道初，入太學，見陸九齡德容粹益，親炙之。同里沈煥、楊簡、舒璘皆聚於學，朝夕以道義

切磨。後師事九齡弟九淵，得其指授，具有原本，大旨在於發明本心。其傳金溪之學較楊簡爲篤實。嘗言人心與天地一本，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與天地相似。又謂爲學當以聖賢自期，仕宦當以將相自任。其所講明體用，兼綜於《書》《禮記》，論說尤詳，成就後學甚衆。<sup>(九)</sup>

袁燮爲南宋名臣，身受教於陸氏兄弟，而其子亦多爲宋進士出身，仕至高官，亦傳播陸學。而桷之曾祖袁韶親炙於族叔袁燮。蔣學鏞《鄞志稿》之《袁韶傳》云：「少受業於正獻公燮。」<sup>(10)</sup>光緒《鄞縣志》說法大致相同，《袁韶傳》：「幼學於族父燮。」<sup>(11)</sup>故袁氏家族得自陸學顯然要比朱學明顯。鄞縣自史蒙卿始將朱子學傳入。民國《鄞縣通志》對歷史上各種記載加以綜合，《史蒙卿傳》云：「初，四明之學祖陸九淵。蒙卿始由楊氏以溯朱學。著書立言，一以朱子爲法。」<sup>(12)</sup>袁桷曾爲史蒙卿作墓誌銘，史蒙卿又爲其舅輩，故對朱學有所研究也就不足爲奇了。

朱陸之異同，前人論述已經頗多。不必贅言。簡單來講，朱學是「道問學」，陸學是「尊德性」。故二家途徑不同，但都超不出儒家之範圍。故儒學北傳後，許氏學派的代表人物許衡講：「自古及今，天下國家，惟有個三綱五常。君知君道，臣知臣道，則君臣各得其所矣；父知父道，子知子道，則父子各得其所矣；夫知夫道，婦知婦道，則夫婦各得其所矣。三者既正，則他事皆可爲之。此或未正，則其變故有不可測知者，又奚暇他爲也？」<sup>(13)</sup>袁桷寫於至治二年的《龔氏四書朱陸會同序》亦云：

程、楊、朱子，本以傳授者也，審爲門弟子，世固未以病文公也。陸文安公生同時，仕同

朝，其辨爭者，朋友麗澤之益。朱陸書牘具在，不百餘年，異黨之說興，深文巧辟。而爲陸學者不勝其謗，屹然墨守，是猶以丸泥而障流，杯水以止燎，何益也？〔三四〕

可看出袁桷反對門戶之見的互相攻伐，認爲於世無補，另外也有爲陸學鳴不平之意。袁桷雖沒有系統的朱陸學術思想著作，但長期身處翰苑，又爲當時文壇領袖，故其見解還是值得重視的。

#### （四）

元英宗至治三年（一二三三），袁桷得丞相拜住信任，任侍講學士，已是三品高官，在仕進南人中實爲不易。然八月朝廷發生南坡之變，英宗和丞相拜住被鐵失等人殺死。這雖是蒙古統治階層內部的權力之爭，對袁桷的影響卻很大。他是拜住所信任的南人，自然感到恐懼異常。政變之後，「賊黨赤斤鐵木兒遽至京師，收百司印，趣召兩院學士北上。」〔三五〕從中可以感受到當時緊張的政治氣氛，他大概感到了自身的危險，到泰定帝元年（一二三四）三月就辭官歸隱。

這一次真正的遠離政壇，也使他對政治感到灰心。離開大都時幾乎是倉皇出京，不難看出南坡政變對其影響之深。對袁桷來講，最主要的影響是：他修遼、金、宋史之事被迫中斷。他爲修史準備了二十年，且四明袁氏世代藏書，爲故宋藏書大家，從他所寫《修遼金宋史搜訪遺書條例事狀》可以看出，修史之書已大體齊備。但在沒有漢文化修養的泰定帝那裏，修史根本算不了什麼大事。袁桷因自己的南士身份，對政治既參與又遠離，常有畏禍心理。他在《書趙監酒墓記後》云：「世之畏禍者多矣，變姓之張祿，別族之輔氏，蓋思以自全也。」〔三六〕「思以自全」態度的背後正是爲了躲避災禍。

他的謹慎和淵默在主修《延祐四明志》時，表現在對他的族人袁鏞因抗元被殺的態度上。這是當時影響很大的一件事，袁鏞也是四明名士，王應麟爲此還寫有悼詩，但《延祐四明志》對此事卻隻字不提，也不爲袁鏞立傳。因爲此事，他遭到清代全祖望的苛責，全氏《延祐四明志跋》云：「清容文章大家，而志頗有是非失實之憾。如謝昌元、趙孟傳皆立佳傳。袁鏞之忠反見遺，蓋清容之父亦降臣也。」<sup>(二七)</sup>不敢給袁鏞立傳正是爲了家族利益，以袁桷的學識，他並非分不清此中利害，但這件事他最好的辦法就是緘默不語。

實際上，袁桷的心態還是極爲矛盾和痛苦的。其父袁洪投降元朝，被講求氣節的宋遺民看不起。爲尊者諱，這影響到了袁桷治史的態度。但他的出仕卻不是單憑他自己努力的結果，而是由袁洪、王應麟、戴表元等江南名士共同推薦的結果。其實這種現象並不奇怪，如當時名士牟巘是宋遺民，但不妨礙其子出仕新朝，這更主要的是由家族利益決定的。袁桷《陳縣尉墓誌銘》云：「皇元合一，皆失仕歸里，挾策授徒，疏糲自給，俱不能享中壽。子弟不自振飭，復歸爲農。」<sup>(二八)</sup>在時代鉅變前，靠讀書仕進的讀書人和原來的世家大族皆失去了屏障和往日的榮耀，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嚴重的打擊。此時南方士人要想保持家聲不墜，無論多麼不情願，爲了家族利益也只能投靠新朝。其師王應麟執掌東南文壇，雖做遺民，但也應元時四明行政長官之請，寫了很多歌頌元朝美政的文章，多多少少反映了對元廷的認同；戴表元也爲生活所迫，出任較爲低下的教授一職，這些都反映了當時的一種趨勢。有時我們看待歷史，往往在有意無意地把它簡單化。

實際上，仕進的袁桷一直在翰林院或是集賢院任職。身爲南人詞臣的他，並未擔任過實職，對政治也都是—種疏離的態度。他很少表明自己的政治態度，或者說也不敢表明。和他一起在翰林院任職的漢人王惲和張養浩都曾任地方實職且做出一番功業；即便是資格遠沒袁桷老的馬祖常也因是色目人而從翰林院轉任御史等實職，這些同僚都做出相應的功業。也許，正是因爲他沒有機會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才全心致力於詩文創作，這點也使他和虞集一樣，成爲延祐、大德之際的文壇領軍人物，並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提攜仕進的南方士人。

## 二、袁桷著述考述

袁桷爲元代初中期著名文士，是有元一代文獻大家。其早年師從戴表元、王應麟，且身處朝中達二十餘年，著述頗豐，故於當時頗有影響。元代著名文人蘇天爵《袁文清公墓誌銘》：「公於近代禮樂之因革，官閥之遷次，朝士大夫之族系，九流諸子之略錄，悉能推本源委而言其歸趣。……昔宋南遷，浙東之學以多識爲主，貫穿經史，考覈百家，自天官、律曆、井田、王制、兵法、民政，該通委曲，必欲措諸實用，不爲空言。」<sup>〔五〕</sup>很明顯，袁桷之學以儒家之禮樂思想爲根本，加之早年又受其師王應麟嚴格的史學訓練，行文嚴謹，不失法度，而不尚空言，故其於元代影響鉅大也就不足爲奇了。元人王元恭稱贊說：「始從剡源戴表元學績文，脫去凡近。長師深寧王先生，授以文獻淵懿，深有警發。尤長於

論史，悉究前朝典故。」〔二〇〕今就其作品及版本源流，目力所及，考述如下：

(一)《延祐四明志》

此書爲元時馬澤修，袁桷、王厚孫纂，實主其筆者爲袁桷。王厚孫爲王應麟之後，他與袁桷全力合作，遂成一代名志。時馬澤爲慶元路總管，袁桷任職集賢，王厚孫爲鄞縣訓導。

袁桷曾在《四明志序》中言及編此志之目的，謂：「世祖皇帝聖德神武，混平寰宇，首命秘書監儒臣輯《大一統志》，沉幾遠略，與昔聖人意旨吻合。然而郡志缺落，其遺軼未備焉者，不復以轍於上。馬侯澤潤之固嘗爲中秘官，知之矣。暨守四明，乃曰：『明舊有志，今爲帥大府，浙東七州，推明爲首，阨塞戶版，物產地利，是宜究察以待問。清風舊德，與昔之高閥巨閥，屬於宅里者，猶可考也。』謂桷久爲史官，宜有述。」〔二一〕

四明建置：唐武德四年（六二一）於句章置鄞州，開元二十六年（七三八）於鄞縣（後改在鄞縣）歷爲州、郡、府、路治所，南宋紹熙五年（一一九四）陞明州爲慶元府。元至元十四年（一二七七）改慶元路，大德六年（一三〇二）又爲江浙行省浙東道宣慰司治所，故四明爲浙西重要城市。袁桷一直在翰林院、集賢院供職，在朝野頗有聲望，又爲慶元鄞縣人，爲修志之最佳人選；馬澤，字潤之，乙太中大夫，爲慶元路總管。《至正四明續志·職官類》：「馬澤，太中大夫。延祐六年十一月之任。」〔二二〕延祐七年，《延祐四明志》修成，其間只用不到一年時間，可見馬澤提供了豐厚的物質基礎作爲保障〔二三〕。另一人王厚孫，字叔載，一字燕貽，自號遂初老人，王應麟之孫。康熙《鄞縣志》有《王厚孫傳》：「王厚

孫，字叔載。……袁桷纂《四明志》，嘗令厚孫分撰二考。」<sup>(三四)</sup>

《延祐四明志》原書分二十卷，每卷前有小序。元代就已刊刻。其中《四明志沿革考序》、《四明志職官考序》、《四明志人物考序》、《四明志山川考序》、《四明志城邑考序》、《四明志賦役考序》、《四明志學校考序》、《四明志祠祀考序》、《四明志釋道考序》、《四明志集古考序》十篇序言皆為袁桷所親撰。

錢大昕《補元史藝文志》：「袁桷，《延祐四明志》二十卷。」<sup>(三五)</sup>其所見二十卷未知何種版本。《延祐四明志》自元之後就已殘缺不全，《四庫全書總目》所用浙江巡撫採進本，實與後世諸家收藏為同一版本，亦是目前最通行之本。

《總目》：「書成於延祐七年，蓋慶元路總管馬澤屬桷撰次者也。凡分十二考：曰沿革，曰土風，曰職官，曰人物，曰山川，曰城邑，曰河渠，曰賦役，曰學校，曰祠祀，曰釋道，曰集古。條例簡明，最有體要。……志中考覈精審，不支不濫，頗有良史之風。視至元嘉禾、至正無錫諸志更為駁洽。惟自第九卷至第十一卷為傳寫者所脫佚，已非全帙。然元時地志，抄帙無多，存之亦足以資考究，固未可以不完廢也。」<sup>(三六)</sup>因缺三卷，故為十七卷，四庫館臣所見亦皆十七卷本，已非二十卷。

周中孚《鄭堂讀書記》：「《延祐四明志》十七卷，寫本，元袁桷撰，《四庫全書》著錄，倪氏補元志不載，錢氏補元志始載之，原書凡二十卷，今自卷九至卷十一久佚，故止有十七卷。凡分沿革、土風、職官、人物、山川、城邑、河渠、賦邑、學校、祠祀、釋道、集古十二考。所亡之卷，乃城邑考下及河渠考上耳。其所謂『集古考』者，即藝文考也。每考各繫小序，義理謹嚴，考證精審，而辭尚體要，綽有良史

風裁。」<sup>(三七)</sup>

從周中孚記載看，與《總目》所見當同一版本，十二考順序相同，所佚之卷皆為第九至第十一卷，又可知錢大昕所見之二十卷本實際只有十七卷。後世諸家所藏，則只是抄本不同，而實際只有十七卷，皆與《總目》為同一版本。如《抱經樓藏書志》：「《延祐四明志》，二十卷。按：原本二十卷，闕九至十三三卷。」<sup>(三八)</sup>又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延祐四明志》二十卷，抄本。元袁桷撰，原闕第九卷至第十一卷。文清為文章名家，此志世亦重之。惟全謝山氏謂其有是非失實之憾。」<sup>(三九)</sup>從以上記載來看，上述諸家所藏，儘管其本來源不同，但都與《總目》為同一版本，並未有區別。

(二)《清容居士集》

《清容居士集》流傳至今有五十卷，其第一卷為賦；第二卷為騷辭；第三卷至第十六卷為詩；第十七卷為贊；第十八卷至第五十卷為文。此集流傳至今最早的版本為元刊本，《四部叢刊·集部》收有此集，係據上海涵芬樓所藏元刊本影印。此本可以得見元刊本全貌，是此集目前最可靠的版本。傅增湘《藏園羣書經眼錄》：「《清容居士集》五十卷，目錄二卷。元袁桷撰。缺卷二十九、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七、四十八、二十七、二十八、四十九、五十抄補。傅氏藏書收此本。傅云：『乙卯歲董授經以五百元收得，後歸袁寒雲。』」<sup>(四十)</sup>傅氏所收之元刊本已不全，故有些卷數已有不同，周振堂《善本書所見錄》卷四亦有著錄，卷首有藏書詩，與傅氏所藏當為同一版本。

元刊本中另一種為陸心源、張金吾收藏，陸心源《儀顧堂續跋》：「《清容居士集》五十卷，目錄二

卷，後附王瓊所撰謚議，蘇天爵所撰墓誌銘。每頁二十行，每行十六字，字皆趙體，與元刊《玉海》相似，當爲同時所刊，上海郁氏宜稼堂刊本之所祖也。卷五十後有永樂丙申畏齋王肆手跋。言得此書蟲鼠損傷，於暇日補治，則中間抄補，皆明初人筆也。是書抄帙尚多，刊本流傳極罕。余又藏舊抄本，爲愛日精廬張月霄舊藏，後錄王肆跋，當從此本抄出，恐世無第二本矣。」<sup>(四)</sup>陸心源之跋語說明：其一，他所藏元刊本亦不全，經明人補治，故書中間有些卷數字體不一致；其二，他所藏元刊本刊刻時間與元刊《玉海》相似，故此集刊刻皆在袁桷故後；其三，郁松年刊刻之《清容居士集》亦從陸氏藏本出，此點郁氏未提及；最後就是張月霄愛日精廬所藏與此本爲同一版本。張金吾《愛日精廬藏書志》卷三三別集類有《清容居士集》：「五十卷，舊抄本。元袁桷撰，後附謚議，王瓊撰，墓誌銘，蘇天爵撰；王肆跋，永樂丙申。」<sup>(四)</sup>張氏所藏出自陸心源，證明與陸氏元刊本爲同一鈔本。又吳焯《繡谷亭薦習錄》集部二亦有《清容居士集》五十卷，未明其版本所據，據前陸心源跋，則亦可能爲此元刊本的抄本。吳氏小序謂：「元侍講學士，謚文清。鄞袁桷伯長著。伯長在世祖朝久居館閣，製作多出其手。」<sup>(四)</sup>吳氏言伯長活動于世祖朝，誤。袁桷由成宗朝出仕，至武宗、仁宗、英宗朝，達二十餘年。

郁松年將陸氏本整理校對後，於道光二十年刊刻，即爲宜稼堂本。此本後收入《四部備要》，是目前所見流傳最廣的版本。郁氏《清容居士集》後附有劄記一卷，敘其刊刻原則及始末。郁氏互校的另一本爲錢辛楣之抄校本。其劄記序曰：「抄本爲毛君生甫從嘉定錢少詹事辛楣先生精抄，校本傳寫處偶有與原本違異，足證原本舛誤。余幸其可據，凡原本脫衍淆譌，輒以刪易增補，疑者存之。至兩